

# 坎 坷 的 路

(朱道南同志革命回忆录)

(征求意见稿)

一九八五年十月

同志：

“朱道南同志革命回忆录”是根据录音整理，未经本人审阅。标题是另加的。由于朱道南同志已病故，为慎重起见，所以印此征求意见稿，敬请提出修改意见。

同时我们设想就“革命回忆录”、搞一个朱道南同志专辑。为此，想搜集有关朱道南同志照片，笔记、遗物、传略、怀念文章等有关资料。望朱道南同志的亲属，及同志们给予大力协助，特致以谢意。

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

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

# 坎 坷 的 路

历史的讲，枣庄地区也是有其今昔，今来于昔，昔为今鉴；前者是规律，后者是作用。枣庄地区过去如何，今时又是怎么样，促其变迁的力量来自何处，这岂能是无源之水；只有洞晓先辈们的“创业维艰”，才可激励后一辈感知自身的“守成不易”，今昔的对比，于祖居斯土的继承者来说，何尝不为重要。

## 一、枣庄地区的今昔，非比寻常

枣庄市的建置基础是峄县，峄县的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崔、宋、黄、梁、孙、褚、王、鲍这“八大家”的手里。齐村的崔广沅是前清的翰林，恒兴的王宝钺是前清的进士；他们父荫子袭，父毒子承，这种根基相沿的官僚地主，兵压棒子段之残忍，当可想而知。除此以外，还有象峰城拥有一百多顷地的鲍初民，富坝子黄，牛山孙等等所谓的“土财主”；他们土明土臭，但对于穷苦老百姓可见无尚的司命之主可，其剥削手段之毒辣，比起官僚地主来，无稍逊色。

财主们的外庄子遍布峄县坡，长工和佃户也遍布峄县坡。年年如是，年年稼季一来，就愁坏了佃户，忙坏了地主老财的“管家”；佃户们愁的是交完过没有了自己的口粮，管家忙的是替东家“闾边”，地头估产。农事一完，结果愁的没有白愁，忙的也没有白忙；佃户们连稀的喝不上，财主们却是“仓库实，府库充”，粮食堆积如山，银钱钞票撑破箱笼。长工和佃户的肉肉被榨净了，还有骨头，骨头里还有筋，拿过来敲，敲断了再吸。地主对穷人，从来没动过恻隐之心。陈潮的荣继珍他家也有一百多顷地，张林就是他的外庄子，他家卖粮食都是在春天，春天正是穷人缺粮食吃，挨饿的时候。地主家卖粮食都叫“开仓”，猛一听“开仓”好像是赈济，放粮；岂但不是，而是把他在庄稼季大斗量进的，“陈陈相因，霉变不可食的大仓之粟”，转可以高价，小斗再卖给穷人。穷人原来生产的粮食就是这样的吗？……那有什么法子，缺吃的啊，穷人就得干受着。

翰林的四儿子崔玉夫，一天骑着马从当街上走，帽子被黄摊上的棚纪了刮掉。立时他象发了疯的野兽，他不怨自己不留神，也不怨骑着马走路太高，把一股无名的怒火对着卖东西的人发泄开了，把祖传的官僚封建势力对着赶集的人使开了；吆令撤去所有遮凉的布棚，都得保证日后赶集不再重扯，要不，不准来卖东西。你看还了得，不就为了

刮掉他的草帽，就如此这般翻江倒海，令行禁止吗；那么别的任何事，谁胆敢违忤他，就可以设想到结果会怎么样了！

这里还有一樁事是出在为了爱惜自己的庄稼上。咱们知道，凡是正经庄户人家谁不爱惜和护持自己种的青苗，除非他是傻瓜；特别是阳春三月正在拔节孕穗的麦苗子，那就是庄户人家的命。可是，夏庄的王侍卫家在那年春天的这个当口上，把几匹马放进了人家的麦地，连吃加糟塌，这简直是耍人的老命。人家疼得揪心，强噤住了喉咙眼里的这口气，把马给遛出地来。哼！这可不得了了，这就惹恼了王侍卫；你别看他他是皇帝的马弁，也只为他是皇帝的马弁才是乡村邻里的太岁！“好，你穷小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”结果弄得惊天动地，制着这家子请了两桌客，才罢甘休。你看主多大，奴多大，多大的泥鳅就能掀多大的浪。

地主老财都这样扬言：长工佃户的小锅儿都支在他脚面上的，小屋儿都盖在他抓钩子头上的，小命儿都攥在他手心里的，踢锅、扒屋，处死那随他的便，他看谁家的女孩子好，就霸占过来，谁家娶的媳妇有点姿色，就要享受“初夜权”，这也有他的自由。

文化呢，就更不必提了，糊粥汤儿“不挂碗儿”灯笼裤子”露风寒，还能谈得上学文化吗？尤其你到山里，十个庄，八个庄别想找着个识字的。过年时，能央求着人写上副对联，甚不容易；即定能，往门上贴也不知颠倒。因而时常见到有人把“槽头兴旺”贴到老平人的床边，把“身体安康”贴到牛棚里去。这绝不是笑话，是残酷的现实。穷人不是终年，而是终生过着“无衣无褐，难以卒岁”的生活。夏天，八、九岁的孩子哪里穿过衣服，都是浑身上一丝不挂；尤其是八、九岁的女孩子也是那么样的赤身露体，难以顾得上羞耻，令人寒心。处境若此，穷人不得不自我安慰地说：“笑冬不笑夏，走着走着都不怕！”是啊；是不怕啊，还是没有啊？穷人的这种“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的悲惨遭遇”到底从何而来，这是我在上学时代确曾考虑过；而没能解决的一个问题。

“五多”是崞县在那时特点。第一，就是上述的佃户长工多。佃户们在正常年里，是能够忍受得了的，一旦碰上个歉收的年成，或者兵荒马乱，再加上地主东家的剥削决不松懈，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就难免想三想四。但，这可便宜了资本家和军阀；看吧，中兴公司该趁机招窑户了，窑门下的一些“官迷”该趁机招兵了。于是出来了第二，下窑的多；第三、当兵的多。自古兵匪一家。象那个胆子大一点，又不愿远离自己的乡土去当兵的人就去闯土匪；上了“马儿”以后，随着军队的驱动，趁火打劫，去抢东西。土匪便装，跟农民不分，便于活动，东西来得容易，干得人多，所以就土匪如毛。这是第四，土匪多。不过，还有那么一些“一老十成的编筐篓，不跟牛通胡弄穷”胆子小一点的人，却慎慎重重地选择到适于自己走的一条路——逃荒要饭。这就是第五多。”古人说得好“志士不忘在沟壑”；在那么些经常挣扎在饥饿战线上的，时刻受着“饿死填沟壑”威胁的人们之中，不乏其“有志之士”的，所以说，这就是我们发动革命的基础，就是打倒封建统治阶级的主力。相对地说，这也是崞县革命力量较早发动

起来的基本因素。

在“五多”之中有个“下窑的多”，关于这一点必须补充叙述。下窑就是穷人由跟着地主老财当长工，当佃户，转而跟着资本家当工人。当工人的命运并不比当长工当、好佃户；打个比方说，也就等于爬上来“火坑”，却又掉进了“地狱”。俗话说：“下窑，就是埋上还没有死的”。这话说得有来由：下了窑时时听死，上了窑才能认定自己的生命暂时被延长了一天，摊班下窑的人，总是先在腰里挂上盏小矿灯，然后用手攥住绳子，两腿往下边绳子上摆，绞车就开始往下送。不过，这一刹那你可要当心，稍一疏忽，掉下这四十八丈深的井口，就是粉身碎骨。下井之前，矿工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，由于“唰”然下降的速度太快，人到了井下，心好象仍悬在井口上。资本家曾为多出煤炭设想过千遍，万遍，就是不曾为工人的安全设想过一次。且不说工人在井下干得怎么苦，怎么累，主要是时刻受着“死神”的威逼，令人难以忍受。“捅窝”和“掉水”……是窑底下灾难性的事故。工人们在等等事故当中大批大批的死亡，有些人死后竟尸骨无存，惨状真是难以描述。那时的煤矿叫“中兴煤矿公司”，据说是黎元洪的儿子黎绍基跟日本人合股经营的，工程师是德国人，绰号叫“老毛子”。要知资本家是没有地区界限的，你无论他是外国的，还是中国的，都一样对工人没点体恤，没点疼热，尤其是外国的还得更甚一层。一年到两头，死伤在窑底下的工人不计其数；但死一个工人，他们为之所付出的代价，也只不过“一百吊大钱”，其它就再没什么了。

穷人多，这是个基本的，其它任何一种多都是派生的。再例如“土匪多”，这是天生成的吗？不唯不是，而且走上“闹土匪”这条路也并非轻易。不过，既定之后渐习于得东西的一举手，一投足之走，以至于凡事做来不拒其细、不怯其大，哪干得哪干不得就成了不须着意的事了。象“临城劫车案”这样搅动世界的大事件，他们也照样搞得出来。说起来这件事，是出在一九二三年孙美瑶这伙土匪身上。这伙土匪的势力非常了得；他们的当家的除了孙美瑶以外，还有周天伦和一个外号叫“四圈把”的周天松等人。据说那时上海、天津都有他们派去的坐探。一天他们打听到上海刚开完了“万国储蓄会”，有一列从上海开往天津的火车，准时于×日×时路过临城。事先，孙美瑶亲自带着人住在孙景庭家里指挥，另在埋伏的地方把铁道掀去了一节。等火车一来，他们纷纷爬了上去，把火车上的三十多个外国人撵了下来，其中有荷兰的副总统，有××的闺女……。他们把这些外国人弄到山里，全拖到抱犊崮山当顶去了。外国人平时吃米饭，都是牛奶、面包，到了抱犊崮山顶，这东西就怪稀罕了，饿极了，连咱们的高粱煎饼也不得将就着吃上一点。“临城劫车案”这个问题是不小，结果引起了长时未息的国际争端。

枣庄原来是卓山之阳的一个偏僻乡村，其迤西的东大洼、南马道，大小洋街、局里、西车站……都是随着历代此间采煤的发展，才展现出来的建筑群和街道。彼时，尽管还甚简陋，其居民数量和消费量已使它升格了；因此，它由小小乡村一跃而为峰县北部的重镇。始料不及，这里地下煤藏量的丰富和煤质的优良，竟是使其一升再升，一跃再跃的独擅之资；时至今日，枣庄和峰县的隶属关系被对调了过来，前者成了省辖市，后者成了前者的下属区了。

枣庄市区背负群山，面对诸峰，它好象蹲在这个天然的帷幕当中。峰城地处南山之

端，端底就是它南开的门户。由它向东、向西的南北二山之间，一片平畴沃野，铁路公路纵横交错于其间，象奔腾跳动的脉搏，永无休止地把各类物资集中拢来，再疏散开去。源于北部山区的沧浪之水，其主流和支流象涓涓不已的血液，网络贯串于其中，润泽过这里的田园，冲过前面的山峡南去。峰县的建置古老，历史悠久，素为干戈扰攘，敌我必争之地。因而这儿的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。各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不少大勇大智的人物。尤其“抗日战争”和接踵而至的“国内革命战争”这两个时期的艰苦卓绝的伟大时势，在此间缔造了许许多多的近代英雄。他们既已茹苦含辛，牺牲奋斗，在革命的业绩当中作出了贡献，而在革命史册里也应当有著述他们的篇章；以表其对革命的精忠，还在于永久地垂范后昆。

## 二、我开始走上了社会

我一九〇二年出生在现薛城区张范乡北于村，自小上过十年私塾，十六岁上进了初等国民小学，在高等小学毕业后，便考进了“山东省立师范”。一九二五年夏，在这里经田厚粹介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。一九二七年三月在长沙黄埔第三分校“由暴崇德，刘赤血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的“马日事变”后，经谭代英同志的同意，我到了“武汉中央军校”。在这里没过多久，我就跟着叶剑英同志从武汉整装出发，路经九江、南昌、南雄和韶关等地，辗转两千多华里，历时三个多月到达广州。在这段艰辛的岁月里，我和叶帅朝夕相处，得获教益非浅。行军期间，因反动派意在寻衅滋事，消灭军校学生，叶帅果断地把我们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，巧妙地回避了过去。到了九江，张发奎又横生枝节地缴了我们的枪，叶帅机智地将我们合并到四军军官教导团，重新武装起来。到达广州和张范黄范高岭附近的四岭营，张发奎第十师师长廖培南又阴谋取缔我们；在叶帅的疏导下，这一阴谋被暴露，被粉碎了。三个月来，几经波折，赖叶帅的回狂澜于既倒，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的“广州起义”保存了主要的武装力量。

“广州起义”之后第三天，教导团被编为“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”，我被编在四师十团，十团的党代表，由徐向前同志兼任。一九二八年春，四师打下了惠来，与彭湃同志领导的“海陆丰起义”的农民相配合，在海丰召开了苏维埃政权成立大会，我是参加大会的红军代表之一。大会之后数日，反动派围剿我红四师，经过多次英勇战斗，终因敌众我寡，损失过大，而不得不分散打游击。我个人，因为浑身浮肿，又患杂疾，再加吐血，只得与伤病员一起在山洞里休养。不久，由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不断搜山，伤病员也被冲散。从此，我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，伶仃仃仃，独处荒山僻野，过起了野入生活。这期间，我拖着个有病的身子，挨饿受冻，自且不说，最感痛苦的是找不到党的组织，精神上感受不到党的温暖，确实是度日如年。

就是那么一天，我从甘蔗地里出来，不幸被当地民团发觉而遭逮捕。他们先后把我关押在大集镇的民团监狱，陆丰县监狱和国民党军第五师监狱；倍受人身摧残，极尽严刑逼供，但我始终一口咬定：“我是张发奎二十六师的落伍散兵。”没有供认出自己的红军和共产党员的身份。当时，敌人规定即是张发奎部的散兵游勇，如无人取保亦行

处决。我在异乡，举目无亲，那里去找保人。在我面前，正是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，突然喜从天降，来了我在武汉军校的一位同学，名叫黄军，他主动将我保释。我在被释放后，因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和党的组织，只好采取了个权宜之计，于一九三〇年夏，回到了老家山东。

我回到家以后，方圆左近都知道了，差不多全县都知道了。这样说，不是自诩，而是有几方面的原因。第一，我上学的时间比较长一些，连私塾加学堂总有十六、七年。上学时间长，同学就多，这是必然的事。那时，学校少，学生向一起集中，跟我一块上出学来的同学，全只各个角落都有。这时他们都成了知识分子，虽然不是什么贤达，什么名流，但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。第二，上学那当儿，我的功课学得都很棒，特别是国文，每季考试都是甲等前三名，从无殿后现象，回回领品学兼优的奖状。因此，我受到老师的器重和同学们的尊敬。第三，学生中我们也有比较穷的一帮，这一帮对另一帮豪门绅士的子弟看不惯，不顺眼，专意跟他们找摩擦。两下里闹起来学潮，校长处理不了；打起架来，头破血出，打伤的人都抬到县长大人的大堂上去。而我就是带头闹学潮的一个。第四，我的舅父是个有名的知识分子，他在县里的声望很高。所以，我认识的人和认识我的人，实因此四方辐辏。更由于从那以后，我又上了黄埔军校，而且多年不在家，现在“猛不丁儿”的回来了，这在往日的老同学当中，就不能不是一时的“传奇式”人物，就一而十，十而百地风传开来，遍及全县。

本来嘛，上“黄埔军校”的多，是峄县的一大特点。细数起来，大概不少于二十三十个人。但同是“黄埔军校”培养出来的学生，他们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可不尽相同。如韩定的刘安琪、他父亲卖花生，他是张捷三同志（原峄县师范校长）的学生；上完了十三期“黄埔”以后，当了国民党军的司令，自卫战争时期，曾在青岛驻过防，还有邹鸣的高管元，他也是黄埔学生，现在台湾当国防部长。然而，另一些上过黄埔军校的人却不此之图，而一心一意跟着中国共产党去求真正的解放。我就是此中的一个。

俺北于姓朱的，是一个不小的封建家族。这个家族凭借着封建势力做了不少的坏事，也杀了不少的好人。

我，幼失所怙，四岁上死了父亲。前有三个哥哥，我的排行是老四，我自幼尝够了不平等的滋味，受尽了折腾；所幸的是受教育的权利尚没有被剥夺。在受教育这个阶段，我看过不少的旧小说，象《鸣鸟传》、《七侠五义》、《水浒》……我都爱看；看完了之后，也爱七想八想；总是同情上面那穷困潦倒的人，憎恨上面那些为富不仁的人；赞成和喜欢上面那些杀富济贫的英雄好汉；觉得他们干得那么样的痛快，有时竟而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人物，而逸兴起来，不过，这只是倏然而即逝的念头罢了。而真正参加革命的想法，还是产生在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受到了这方面的教育，懂得了“农民的痛苦，来源于封建剥削”的道理以后；还在于我在南方过了几年，亲自实践了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这一革命斗争以后。斗争生活使我真正明白了要使农民不受压迫，光是怜悯和同情还不行，非得跟着共产党发动群众，领导群众求解放不可。天下的老鸹一般黑，世界的、全国的、峄县的、自然里边也包括俺北于的封建统治者，统统都应当被打倒，我就应当是它的叛逆。为了彻底打倒它，牺牲奋斗，当所不惜。不这样，这人间的“自由和平等”就不足以实现，也就只有象国民党那样在口头上喊喊而已。

一九三〇年，峰县地方上的敌我现状，表现为强弱不对等的两个势力方面。这两个势力方面的一个明显的象征，是敌强我弱。在敌我相互斗争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当中，我们利用了敌人，发展了自己；力量于是相互增长，达到敌人势在被我战而胜之的地步，虽然还没到最终。现在说说这个现状。

在鲁南地区来说，枣庄系革命的发源地。不过，一九三〇年那时，这里在表面上虽看不出党活动的迹象，但是有地下党员，不但有，而且很早以前就有。我知道的就有韩庄的田慕韩同志和项伯峰，至于在什么地点，作了哪些工作不甚详细，只记得前者是山东省委委员，后来牺牲在济南，后者却变节自首了。这说明为党做工作的人也是“苍黄反复，良莠不齐”的。大约在一九二八年，或许稍晚一点就建立了党的组织。资格比较老一点的党员有张福林和邱焕文等同志。继续发展的党员有知识青年李微冬、杨辛和董鸣春等同志；这些后起之秀，现在仍分别在机关或部队作领导工作。

我是在一九三七年才跟党接上头的，这时，党的组织称谓是“苏鲁豫皖边区特委”，领导人是郭子化同志。郭子化同志的公开身分是行医兼开药铺，很多党员干部在他领导下，身居下层，以小商小贩作掩护，出色地完成着党所交给的任务。

北伐成功后的二九三二年，峰县地方封建势力的上层人物，随着国民党内部的分裂，而分裂为两大派系，一派是以黄喜堂，梁继路和孙伯龙为代表的“复兴社”，靠山是蒋介石；另一派是以王文清，刘兴隆和白起民为代表的“C·C团”靠山是陈立夫和陈果夫。两派势均力敌，角逐势力，终日花天酒地，吃喝玩乐，做事不多，对老百姓的危害不小。到了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的时候，这些家伙更会祸害老百姓。韩复榘其人对国民党有点离心倾向，是个积极发展自己，准备投降日寇的个人野心家。他在山东办“乡农学校”，原意为了扩充自己，不料想却给地方上的这些家伙搭了“帮架”，这帮子人和跟他们有亲缘关系的人，都趁势捞了一把，当官的当官，发财的发财。一九三五年全县六个区都办起了“乡农学校”，封建地主子弟和他们雇佣的地痞流氓充斥其中，训练的步伐带起了乌烟瘴气，对老百姓“筹枪派款”，无恶不作。

峰县县委部里，许多人是我的同学和朋友，再不就沾点亲戚。这里面也有个农会。农会里三个负责人，一个是我的表哥，一个是我的好朋友王福清，再一个是我的老师王会珍。这个组织其初曾受我们的影响，也帮助佃户打过土豪。不过，由于和县党部本身的矛盾，而“浅尝辄止”了。他们在这里面也禁不住“酒绿灯红、纸醉金迷”的熏陶，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这座“迷魂阵”，说句老实话，我恶心这样的人和事，也不愿接近他们。但也没有法，他们尚有“余勇可贾”不得利用他们，以便为人民做点好事。实际“阶级斗争”这码事在我脑子里比较“淡漠”，只想到消灭那些拿枪的敌人。如果象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那样，我就只有在家里藏着、歇着。

这天，是我回到家里的第五天。忽然，有人跑来告诉我：“县里来了两个洋驴找你……”话刚落音两个人推着自行车跟腔进来了。我一看，一个是我低两级的同学刘明宣，一个是我的表侄刘国清。来意是请我上县城，他们说，全县知识分子都请到了。好吧，我就去，知识分子我也算一个。去是去了，但觉得别扭，水火不相容嘛；我是共产党员，是革命的，“革命”这字眼儿于他们来说，格格不入”要是给他们讲起怎样才能



搞好革命，他们乍听准会吓一跳。那就暂且搁下不讲，讲了这个就不好接近他们了，等该讲再讲。

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”在国民党县党部里是一篇“官样文章”，真正的革命者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的，很反常，这回对我倒真是例外了，把我留下，还客客气气地请我吃了饭，大许他们把我看成今后可能跟他们同流合污的人了！对不起，不敢苟同，“尔为尔，我为我”；练就的“吃苦，耐劳，拼杀干革命”这身硬本事，就是没学“唱高调，说谎话”那一套。另看我穿得不好，要论思想境界，我总觉得“列位明公”还不如我。

在官场，时兴的是穿大褂，戴礼帽，然而这两样我都没有；恰恰这时，他们安排我到齐村去教书。要知齐村是翰林世家的手掌之地，齐村西围子就是翰林的府邸，而今崔翰林还在。他在全县来说，脚一动地就动，县政府里他说一不二。这当口儿，到齐村去当老师，真是非同小可。大家为了这件事议论纷纷。他们说：“没件衣裳穿，怎么能出得门去……就凭着跟要饭的这个样，去不了三天，不被轰回来那就怪邪了……”其实，他们这么个见解，这么个论调，我也听也不听，教书到底凭学识，还是凭衣着。不过，可不能让抬杠，这是大兴其道啊，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在大家中站出来两位好人周济了我；一位是我的老同学好朋友，他给我买了一顶黄色礼帽，一双礼服呢的鞋和一双黄色的线袜；另一位是我的表兄，他送给我一件大褂。大褂可真大，我一试，拖天拉地、穿不起来。我说：“行啊，不管大小给我吧，总比没有强啊！”之后，他们领我到盛塘洗了个澡，剪了剪头发，换好了衣服，由在小学教过我的一位老师把我送到政治处，复又交待了一通。

这里无须一提的，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那位老同学，好朋友，名叫单庭兰，他是单家人，共产党员，是在自卫战争期间，被冻死的。那时，他在我需要的时候，给以资助；而我只能在这一节为党多做一份工作，作为对他的投桃之报了。惜哉！

我去齐村，已是秋凉了。行李无多，一床破被，一件破袄，肩头一扛，徒步而往。颠到之后，依照他们的交待，自然先拜会了校长王伯阳，俟后由他引进陆续地拜见了崔家那些绅董学户。本来我在这些人的耳朵里有点小声名，因此他们都表示欢迎，并说我是个有志之士。是的，我这个“志”，是志在消灭剥削，消灭压迫，你们不喜，你们这些有钱有势，专门剥削和压迫别人的人，都应当被打倒，这个暂且不说，先住下再讲。

到了学校，校长把我介绍给学生之后，我下意识地感到学生们对我这个“土”样，去当他们的老师免不了诧异一番，也避不住咋舌一番。反正从这以后，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他们的老师了。一般地，我跟他们一块做做操，跑跑步，打打球，有时也去爬爬山。肯定的，我这个作风，使他们高兴。至于学生们的家长呢？也说：“这这些年来，齐村街没这样的好老师。……”上课的时候，有意无意地给学生灌输点革命道理；闲扯的时候，或隐或现地给学生讲述点“广州起义”的故事；对当地那种耳食之谈“共产党共产共妻”，若明若暗地予以解释和揭露。一段时间下来，学生跟我的感情愈来愈亲密，学生的思想靠向了我也靠向了革命。于是学生们根据我的要求，对一位最穷的同学王磊给予了接济，他们并且向我表示：“老师你说吧，叫我们拿多少，我们就拿多少！”其实，我也不能让他们拿得很多，集腋成裘嘛，只把王磊学期当中的书籍和鞋袜的费用解决了

就很好，因为他们在家里都还不是“当家”的。

王磊，原来的名字是王景兰，郭村人。他父亲给地主扛活，被热死在高粱棵里。幼小的王磊成天挑着个煤油挑子跑四乡。他看见人家和他一般大的小朋友都在上学，心急得慌。但终日奔波波波的劳碌所得，尚不足以维持家计，怎么能拚得着上学呢？我深深理解他和类似他的一些穷苦后生的心情，专门开了个夜班，让几个上不起白班的都来上夜班。这下子可好了，王磊从那就贪晚摸黑地上起来夜班学；起郭村到齐村离不几里，从不旷课。由于他白紧自张，攻读勤奋，成绩一直很可观。但，就有一事不大顺心，就是尽管省吃俭用，想把卖煤油挣的钱匀出两个来买书籍和文具，有困难。怎么办呢？有困难就有办法，办法我替想；有钱的同学大有人在，在我的倡议之下，同学们都纷纷相助。这下子更好了，王磊的书籍文具甚至鞋袜问题得到了解决，同学们乐于助人的美德也得到了表现，两全其美。这样，王磊又由夜班转上了白班。他毕业以后，我给准备了点煎饼，写了封介绍信，让他跟着牛志远，燕如流，朱连壁……一块去考上了高小。

一九三二年，我被调到峰县教育局里来，担任县督学。这里面，跟我一块共事的人都很好，很合得来。我们成立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。国民党也奈何我们不得，邱博文之流想反对也反对不了。这里面的领导人不断更换，原先是北平大学法律系的一位学生当局长，他是国民党上峰派下来的，后来换了个颜玉栋，换了个潘雪银，又换了个张景亭代理。一次，我因事到武汉回来，张景亭就升任正职了。这说明领导阶层极不稳定。

这时，全县有十几所高等小学校，五十几所初级小学校，二十几所短期小学校。我巡回督导这些学校的教育工作当中，有意识地结识这些知识分子，尤其是出身比较贫苦的小学教员，他们在教学和管理上，甚至其它方面有些什么缺点或错误，都是当面谈，包涵过去，决不给他们张扬到教育局去；一年两度的评比，我向教育局的报告上都是好，不好的也好，好的更好。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工作。

第二个工作是向大家讨回乡政权。

“八大家”历来是峰县地方政权的主宰者，可以说上溯到明清两代，都是如此。那么现在的区乡政权呢？一如既往，即定有的不是他们“亲持其柄”，也是在他们的亲戚，或族众手里为其所左右，如果不在他们手里拿出一点来，将来的革命活动势必掣肘，势必困难。“义无反顾，计不旋踵”，必须立即着手，丝毫犹豫都将招致被动。时在一九三五年，地方的形势是全县六个区都办起了“乡农学校”；这六个区依次是土城、邹坞、西集、周营韩庄、台儿庄和涧头。

“乡农学校”是凌驾在乡政权之上的上司，相当于区。这里包揽着县级的一切大权，随便逮捕，任意吊打，敲诈勒索，奸淫妇女，无法无天。说得干脆一点，这就是封建统治的“借尸还魂”。如果究其为什么来？答案是他们有后台；这个后台就是邹平的“乡村建设研究院”，老板就是韩复榘。韩复榘利用所谓的“梁漱溟乡建派”大搞农村自卫训练，意在把全省的壮丁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中，作为他第三路军的后备兵员，等得日本鬼子来了好倒蒋，好成立华北政府，好有本钱当汉奸。而我们这个地方归第三专员公署，是个重点；他们的根子是韩复榘，既粗实又硬棒；这就难怪他们要胡作非为了。

### 三、邹坞暴动

五区“乡农学校”里有个王效卿，做事从来就肆无忌惮，为所欲为，什么缺德的事都能办得出来。他每到一地爱和地主恶少勾结，爱骑脚踏车，爱别盒子枪，狐群狗党地在一块惹事生非。那回，他到了台儿庄，一眼看见这家有女孩子长得漂亮，淫心顿炽，就带着人把这家除了女孩子以外的人等都轰了出去，而奸污了她。这事一传过来，我真恨死他了，人说：“万恶淫为首”，天地间，能容许这样的肮脏家伙存在，我为此气愤。从那，我在思想上无论何时、何地总没放下过这件事，必至惩罚恶棍而后快！我激于义愤，曾经在邹县对着邵剑秋发火：“你们‘乡农学校’这样纵容他，到群众起来的时候，非杀你们的头不可。”我这样一摊伙子说，他听了并不生气，因为他的思想比较进步，他说：“这里面也并不完全都是坏的，绝对不会挨个都杀！”就是目前，对王效卿这号人，他也觉得无可奈何。

这回，我是专意到济宁办这件事，济宁行署是第三专员公署的上级，到这里找杨再道告状。杨再道是教务主任，人很好，颇有正义感，没做过坏事，他很同情我的观点。不久，真的把王效卿撤了职。不料想王效卿这“行子”手眼通天，在被撤职以后，不知怎么一活动，在蒙阴县又干上了，还是“乡农学校”的校长。好，你王效卿实在有这份专门的“才干”；一头扎进去的是“乡农学校”，再一头扎进去的还是“乡农学校”，如同“鲍狗窃苟”的目的物是臭屎一样。王效卿满以为这一下子没心烦了，“官运”总该亨通了。且慢高兴，蒙阴县我有不少的同学，我马上写信把王效卿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们，他们纷纷据其所短，群起而攻之。算路不打算路来，王效卿又吃不开了，没过多久就又叛免了职；免职就得回来，要不连吃饭的高也没有。这时，时局吃紧，日本鬼子快要过来了。王效卿回到峄县城，投门奔道，认鲍××的“家礼”师父，这下子身列鲍家大院的门墙，成了鲍××的新贵高足。或问：鲍××何许人也？“答曰：”准备日本鬼子来，办维持会当汉奸的汉奸坯子。”物以类聚，您瞧这爷儿俩；到这儿可巧了，二区“乡农学校”校长，邹坞姓袁的干不了，王效卿又通融了一下官府，即被派上了邹坞。时值一九三六年冬季，王效卿这个二区“乡农学校”校长到差视事了；新贵提拔，怎么能不使他高兴呢！好，是他高兴的时候，也是我们下决心搞掉他的时候。

这是以往从没有的事，县长要“考乡长”，真是前无此例，可喜可贺。例子一出来，对原来的统治阶层、乡镇实权人物的震动很大；如邹坞的张连宜和全图文之流，特别是齐村崔家的反应比较激烈。他们考虑此，如一比一的产生，须有半数的乡政权落到其他人手里，怎么办？但，不管你怎样忌，章程压着头皮，想当乡长就得去应试。那末，在我们则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抓乡政权的最好时机，未可轻易错过。商量了一下，齐村镇的李松亭，邹坞的汪奇瑞，渴口的……俺大哥朱绍良……都去参加了这次的考试。考试的结果令人满意，去的人都考上了，都获得了当乡长的资格。这样，乡政权就让我们拿过来几个。而我们这些人一当了乡长，就站在了群众的一边，就当然地受到了群众的拥护。这跟“乡农学校”校长王效卿任意逮捕，随便打骂，祸害群众，还是照办来，是鲜明的对比。

此时，“联庄会”——民困象雨后的春笋纷生。“联庄会”上边是“四县边联”，这四县边就是“临、郑、费、峰”四县的边区，离彼穹远，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达不到，亦即所谓“鞭长莫及”。“联”就是把地方群众组织起来，搞成联防，填补空虚。有歌半支为证：“守望相助法最良，大家团结要自强、联庄，联庄……”

好机会接二连三，几个乡镇的政权刚接过来，就搞“联庄会”，我想，如果可望就此建立起一支人民自己的武装力量，那将是为革命抓到手的最大资本。于是我们就“顺水推舟”，大办“联庄会”。搞这个，我们有条件，第一，我们有群众拥护，第二，峰县“联庄会”总会长是田瑞峰和崔玉柳；田瑞峰是俺大哥他母亲娘家的叔，李卫真在这里面做总务工作。第三，我还拜了一把子“仁兄弟”，象崔玉柳、刘玉东、刘复一、和朱玉相……十五、六个人，在全县各个角落，他们都象些乱世豪杰，在地方上有号召力，有影响，手里都有“两把风”。

在大搞“联庄会”，参加“联庄会”当中的首要人物是刘景镇和朱玉相。

刘景镇是小屯人，成份是富农，住的紧靠山边子，离我家北于只四、五里地。我和他家有点远亲。他的性情直爽，体质健壮，做事挺有魄力，就是好赌，一钻到赌场里去，什么事也不问了。那时乡里时兴的是“乡唱宝局”。一等农忙已罢，从玉露冷冷的深秋、到瑞雪纷纷的隆冬，大庄村里总少不了这玩艺儿，总少不了“有说法”的地痞们钻到这个“钱眼儿”里来。他们也费不了多少周折，无非是请上班子“拉魂腔”，摆上些子赌摊，就轻易地办成了。这里边有：“擲骰子”、“推牌九”、“打麻将”、“压宝”、“吞五和子”、“摸梭棍”……场子里的输赢迷着心窍，戏腔拉着魂，久等着那些情愿上钩的冤大头。场子里，一刹是你赢我输，一刹是我赢你输，这样无尽无休地拉着锯；不管你，不管我，赢了的都得给他——“刘局的抽个头。抽头，名之曰：“撩么”。拉锯的结果，赢者很少见，输者确乎多；输者输得精光，赢者最终只剩“刘局的”一家。末了，“刘局的”把抽头所得，除去戏台上的开支，下余满够供其渡过荒春。刘景镇，人不为不聪明，就是看不透这个火色；志态赌，红脸汉子，输了照付，赢了不起场。“久赌神仙输”，决无好结果。这次，我是专门来看热闹；不，真正的目的还是来找刘景镇，把他引到正路上来。到了他的博场，把他找出来，我首先来个自我介绍，他说他知道；那当然他知道喽，不远的邻居，还有亲戚。接着蹲下，我跟谈起“抗战”的事，他没有信心，对当“亡国奴”抱无所谓的态度；他说，当就当，不当就不当，鬼子来了咱有什么办法！我根据他的思想把“抗战”的道理跟他讲了个通和；从“联庄会”讲到“抗战”的发展，从民族气节讲到民族的前途，从共产党的领导讲到革命的胜利……之后，征求他参加“联庄会”的意见。他说：“那倒可以！”听意思比刚才好了，心里有些活动气了。

朱玉相这人过去曾经“闯”过土匪，也曾伤害过一些人。要知，伤害过谁就跟谁有仇，齐村谁家就思掐他。其实，还不止这一家。说他参加“联庄会”，那没门儿！我想，不管他张、王、李、赵、刘，谁当过土匪搞谁，那哪还有改正过来的人？这样不行，不利于争取人。我给想了个办法，叫他预备六七桌酒菜，把几个乡长、村长、头面人物请来，赔个“不是”认个错儿，了结了“宿怨”。他照办了，他到了酒席宴前磕了三个头，大家哈哈一笑，一了百了；朱玉相也能参加“联庄会”了，大家也落了个“既

往不咎”的君子气概。你看这多好！

刘景镇和朱玉相两人是“博”友。听人说赌博（薄），越赌越薄，好朋友在一块赌长了，也薄气了。这话对不对？一般地说对！就是说在刘景镇和朱玉相二人之间的关系上，不薄了，他们二人不但不薄，却越赌越厚，越赌越亲密。其中的微妙之处就在于：他输了刘景镇替还帐，他赢了他拿着；还在于刘景镇的家里对刘景镇的限制不太严，卖地、卖粮食随便。不要看我跟朱玉相是仁兄弟，要论及过从关系，我们俩不在他们俩以上；他们俩是如影随形，掰不开的生姜，整天一块吃，一块喝，一块赌博，不管哪里唱戏，划局，两个人总是一齐到。他们俩手底下都有一帮青年，跟着玩，跟着混穷，跟着吃干巴饭。

我们的“联庄会”办起来了，刘景镇和朱玉相在这里面都担任上了自卫团的营长。这是一支人民武装的“先河”，应当不违背我们的初志，而奋起步伐。斯时，恰逢邹平“乡建派”的实验摔了一个“倒栽葱”，失败已成定局，各地的“乡农学校”行将“寿终正寝”。当今的人物迫于大局不稳，而惴惴不安。时机成熟，我们应当踏着“广州起义”的足迹，逃在邹坞“乡农学校”举行一次小型暴动，让我们的“联庄会”初试锋芒，小作锻炼；估计我们以往为此所做的宣传工作，已使“舆论哗然”，行动之后，决不敢有什么妨碍。而且邹坞附近几个乡，让王效卿作祟得“不亦乐乎”，群众恨之入骨：“蓄之愈久，发之必速”，是以群众易于发动已成必然之势。这件事办来，也没上级组织可以请示，完全是我自作主张；上级组织这时不大好找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我也不想找，总觉得做出成绩来，叫上级来找我。究其实，不管事情办得成败与否，想法的本身就是错误的。我曾为把这件事办得尽可能妥善一些，专回家一次作了周密的布置，也恐怕人多嘴杂走了风声，只找了石一九，朱玉相和刘景镇三人，跟他们说：“……我们应当以民愤为己愤，处治掉王效卿就是为民平愤！……行动的首要之处，就是不要让王效卿跑掉……”刘景镇和朱玉相二人并为此作了保证。之后，我路经棋厂柳家，在崔玉海家吃过饭回到教育局。

王效卿，人颇机警，也有点“自知之明”，料定局势若此对自己不利，正窥测方向，准备拿腿；也料定由于以往的作为，自己走之不便。他象掐了头的蚂蚱，十分不舒服。“邹坞暴动”这天是一九三七年秋天的下午，朱玉相和刘景镇业经在调集“联庄会”的人员，“末日”临头的王效卿在邹坞街巧逢我大哥朱绍良，他便苦苦地哀求：“大哥：你得救救我……”。我大哥说：“你自作自受，我没法救你……你有武装……”。接着又搬给他四箱子弹，给了他四支枪。你看，我们的“联庄会”所拥有的无非是些“大刀片”和“红缨枪”之类的武器，“土压五”和“单打一”都少数的有。但决定的一点是他怕我们，而不是我们怕他。

“邹坞”是临枣铁路的一个小站，站在邹坞街南边的二华里处。王效卿准备乘这天下午的一趟火车，向枣庄方向逃窜。谁知车误点，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，还没望见车影。天阴沉沉的，眼看着要下雨。他沉不住气了，匆忙地上了马，带着他一向认为忠实的打手，象一条生怕堵门挨棍的狗，顺着铁路北边的马路向东放开了“蹶子”。这一蹶，可苦了“马后喘”，其实并不快，有打手们簇着趟子；他们到了甘霖，天就黑得看不清人了。甘霖在铁路南，我们的网就张在这里。这群野兽闯到里边来了。刘景镇一发

现猫获物，就对之一声断喝：“别先走，把条子——枪，（可能是江湖黑话）——留下，把钱留下，……”王效卿也不知他觉得自己有武装，心里有点仗恃是怎么的，竟敢于向我们放声发问：“你们是哪里的？”“我们，我们是邹县的‘赔钱道’！不过，这回可不赔钱，得要钱；不把条子留下，不把钱留下，就别想离窝！”……他叫这边派个代表去，刘景镇说：“您派个代表上这边来吧！”他拗不过我们，一会儿举着手来了一个，一会儿举着手又来了一个，还不行；那当然不行了，要行，怎么能捞着惩罚这个“罪魁”。紧接着发枪射击，打了起来，仅一条铁路之隔，很近！打着，打着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辆胶轮大车，他们都钻到车底下去了；大车掩护了他们一下，一会儿出来又往东跑。黑灯瞎火，看不清楚，刘景镇和朱玉相带着人一直追到修庄；打没打死人没检查，反正自己没伤亡。天越阴越厚，下起了毛毛细雨。这时，跟着刘景镇的徐广有，忽然发现前有条黑影晃动，刘景镇叫对着黑影打一枪，于是徐广有便端起自己的“单打一”，一瞄黑影，“嗵”地打了一枪，随着枪响听得那水沟崖上也响了一下，其他的人都“四打崩散”，霎时跑没影了。刘景镇拿着手电筒走近前一照，死人上身穿着红毛线衣，手拎一支上缀绿穗的盒子枪，可不，正是王效卿，他被打死了。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：“八成他真是恶贯满盈了，你不，怎么那么巧！”是打得准也罢，是打得巧了也罢，打死个“乡农学校”校长可不是个小事。下一步怎么走，死尸放在哪里？大家商量，大家想啊，想啊，忽地有人说：“修庄后边净是‘磨石塘，都几丈深的水；绳子一条，石头一块死尸腰里一捆，往石塘里一撩，装知不道‘拉倒’。这法被认为可行，结果被采用了。一个死的处理完了，还有两个活的——‘代表’哩，怎么办？刘景镇和朱玉相率众，尤其还得带着这两位‘代表’，到了夹埠，到了张范，到了于里，至于怎么处理这两个人呢，临时还没打好主意。这事可吓坏了夹埠的王子绍。他说：“我的老哥……你们还带着两个人，怎么还不安置安置的……”（王子绍这人原来跟刘景镇很好，后节可是个坏家伙）接着从于里又来到小屯刘景镇家里。小屯南边就是山，山上有个洞。刘景镇和朱玉相二人把这两个人绑好，劈里塞上东西，送上山，往山洞里一推，生死存亡随他去。事情办完，天晴日出，一夜的劳累，都拖着个疲倦的身子，回到各人家里去休息。

“邹坞暴动”为受压迫的群众开张了心扉，可是在国民党统治阶层的心头上却捅了一刀。以后，据听说西集“乡农学校”也暴动了。这一情况的真实与否虽不大了解，但全县剩下来的几个“乡农学校”都相继解散，倒是真的。解散归解散，属于我们“联庄会”冲击垮台的邹坞“乡农学校”毕竟不能同于自动解散。就“邹坞暴动”本身对国民党统治阶层，其冲击和反冲击的作用日益明显来看，可知事情到这里并不算完。

事情还得说得稍往前一点。

我们教育局跟县党部向来不大调和。我们局长张鸣喈是北大的毕业生，性情耿直不阿。这里面能够跟他性情相近，工作经常保持一致的是张提三同志和我；我们几个人抱成“一气”，对国民党县党部根本不买帐。不买他们的帐，他们跟“蛆”一样就到处找夹缝钻。在教育局直接掌握下的“民众教育馆，里头的几个“角”是国民党党员，这几个人千起工作来，确实像样；所以教育局里的许多工作都是他们代干，而且干得很紧张，很出色。谁知县党部竟找上了他们，怂恿他们对教育局提出来个“退职”辞呈。我们

立即识破，这是威胁而不是应有的意向，是捣乱而不是辞呈所申明的任何理由，只可惜，“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作用，错误地估计了别人的可能，如果不给点颜色看看，我们的，尺寸”岂不是就让他们量准了，岂不就是“尾大不掉”，商量了一下，以“照准”作为回敬。这一下子“西洋镜”被拆穿了，他们活象撒了气的猪尿脬，软巴了；接着便打起了“赖毛”恹起来了。我们指出：“出乎尔者”是你们，“反乎尔者”还是你们；自己说完做完的事回头再给人家“胡搅蛮缠”，这都是无用之用。我们决不“收回成命”……不得已，他们只好伸直了脖子，吃下了这个“以假成真”的苦瓜。看来，他们的邪气至此似乎被抑制了一下，不意这帮家伙却站到我们的对立面去了。

“邹坞暴动”后，这帮宵小之徒跟国民党内的“风云人物”，地方豪绅地主和那些经过考试被撵下台的旧乡长掺和在一块，极尽“众奸放肆”之能事，象一群“绿头蝇”，在一旁瞎“嗡嗡”！他们窜撮张县长：“这事跟教育局有关”，“这事是朱道南领导的”，“得袭南北于、小屯、张范、大小甘霖这几个庄子”，“得抓为首的——这当然指我，齐村镇的李士美、邹坞乡的张友民、甘霖乡的朱绍良、“联庄会”的刘景镇和朱玉相”。他们并且扬言：“除了县大队，还有中兴公司的护矿队参加”……不一而足。枣庄中兴公司跟他们一致，是任人皆知的事实，说有他们参加，这不是不可能，然而这部分护矿队的力量非常“了得”，不止人数多于县大队，而且枪支很整齐。因此，这不禁使参加“暴动”的人心里有些打怵。

这股邪风掬得不矮，不过，对此我心里有数。这时，正值一九三七年的“七·七事变”的前后，眼着强敌压境，国难当头，这事是当前稍有民族感，稍有中国人味的人所不屑于为的，这是一。第二，“联庄会”上级组织是“四县边联”，此怒不可犯。再其次，峰县“县长大人”是一位不失为遇事“三思”的“君子人也”，绝不敢冒失从事。尽管如此，我认为跟他们相应地开展一场宣传战，还是必要的。于是，我也放出了一股风：“邹坞暴动”有五万老百姓，三千条枪参加，“我们‘联庄会’的麻烦决不是好找着玩的，想试试，那可以嘛”，“被惹翻了，说不定还要来攻打峰县”，“打开峰县杀县长，捎带着王、鲍两大家，免得日本鬼子来了他们当汉奸”，“王效卿欺压百姓，强奸妇女，伤天害理，死有余辜，为他‘火中取栗’不是个蠢猪，也是个冤蛋”。……好了，这股风一吹，烟消云散。

#### 四、九、一八以后的局势

一九三一年“九、一八”事变以来，日寇的“铁蹄踏踏”所及，我们的国土点点沦丧。国民党内部崩离析，对团结一致，共御外侮缺乏诚意，信不由衷；一以对一“抗战”虚舆委蛇，一以对敌人暗送秋波。共产党这时犹如一柱擎天。势将独荷“救亡”重担。峰县地区随着国势陆危，情况也一天天的混乱下去。一分为二，这对我们有志于革命的志士，却也因此而获得了回旋的空间和活动的自由；我们充分利用当时的这种可能，搞起了“统战”，发展了革命的武装。

时至一九三六年，地方的封建势力和一些上层代表人物，纷纷建立武装，割据地盘，借以保全个人。县南马兰屯的黄喜堂所部，直接跟国民党中央挂上了钩，给的编制

名称为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第五零支队”，一共有四五百人，黄喜堂任支队司令，崔蓬庵任副司令。崔蓬庵是翰林崔广远的五儿子，跟我的关系非常好。他是日本“早稻田”大学的毕业生，早在韩复榘坐山东以前，就在省里当过路政局的局长。这会儿，他热中于办密务，身任寨子窑的经理；看得出来他无意于干这个副司令。也不过挂上个名就是。这个支队建起的目的不在打鬼子，而在反共，曾在永安庄西南车峪活埋了特委的通讯员。黄喜堂当上了司令，滥发委任。几乎全县的绅士都是他的官，如孙怡然的父亲孙云庭被委为第三游击梯队的司令；实际上不顶用，人家也不听他的。

县北峨山口的梁继璐所部，是第五战区李明扬发的委，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统辖，总部设在徐州。给这部分人的编制全称是：“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第三支队”。下属三个团：第一团长是孟庄任振伦；第二团长是刘复一，给我是仁兄弟，从来没联系过；第三团长是李东岱，我的同学，也没联系。其组织比较健全，有实力。支队设政治部，在这里边的政工人员，不是国民党监农社的，就是原峰县县委部的，都是些反共的急先锋。

从对下述两个人的争取上，可看出“统战政策”的巨大作用。

孙伯龙同志是周营西约四里许李庄人，是我在济南第一师范的同学，他是个“强项”人物。不知为什么他对共产党一直抱有敌意。上学这阶段，我就做他的工作，尤其在他手头拮据的时候，即助之以资斧。及至我到了广州，我们之间的联系仍未中断。不过，不见回头：全管是经过他的手逮捕的，在无锡某学校扣压项伯锋，强迫其自首，也是他干的。我很担心，长此滑下去，不知“伊于胡底”！令人遗憾，以往我对他那么样的好，他现时也不是不拿我的歪主意；他们县委部的常委串通一气，特别是他和李介如两个人家在暗地里算计我；只是限于我的交往广泛，没敢遽然下手而已。至于李介如，他的家是临沂苍山，很反动，一向是中兴公司的走狗。正是他布置了工贼，打入我们党的内部，使得田位东、郑乃序二同志被捕牺牲。一开始建立游击队，孙伯龙同志和黄喜堂厮的搭当。建好以后，他任费部五零支队的参谋长。俟后，因跟黄喜堂齟齬不和，矛盾百出，从中析出，经过我们对他继续进行“统战”工作，他毅然率部加入革命队伍的行列，独建一支“运河支队”，活动于运河南北一带。现在山东军区的顾问童邱龙同志，在这里面当过政治部主任，副政委。我也在这里面当过政委。

邵剑秋同志的大号邵士成，“剑秋”是他的字，峰县城西南槐槐树人。他父亲的名字邵仲礼，为韩庄以北的大地主。在这个地主家庭生活里，使他最不能同意的是他父亲常跟土匪有些“掺药”。其实，这不足为奇，大地主不通土匪是极少数，不过所通可不是一般的小土匪。小的也罢，大的也罢，邵剑秋对此感到辱没了自己。一次，这个土匪到他家里来，他竟要以“兵”礼宾了，如果不是他父亲“拚死拚活”地制止他，这个土匪一准得做他的枪下之鬼。他家一向跟牛山孙云庭家有点“旧仇”，这也不管是地主之间为了争夺一块骨头，互相扑打撕咬罢了；本也无所谓，可他们却认真对待！这时的邵剑秋是个二十多岁、精明强干的小伙子，一下子被卷入了这场家族纷争的漩涡。不知怎么的，四区的一个政权机构竟而安在他家的小楼上；这么着，那家怪得势，孙家不得不充当了几天“草鸡”。时间往前一推移，竟然来了那么一天，韩复榘来临城视察；孙云庭一看，机不可失，顶到临城告了邵仲礼一状，错处只一条——通土匪。可韩复榘最烦



恶土匪，他活象一个“疾捻了鞭炮”，点火就炸；把邵仲礼逮了去没让“回话”就枪毙了。邵剑秋要不是跑得快，恐怕也难免“斩草除根”这一劫。于是邵剑秋带着“杀父之仇必报”的信念，跑到了徐州，通过县党部，通过郎县长，通过……没用多久，孙云庭也就偿上了这笔血债。邵剑秋为了避免“仇仇相报”，远离了家乡，到济南参加了冯玉祥的“抗日联军”，被发到绥远。联军里有好多共产党员在里头工作，因此邵剑秋同志在里面积受了点进步思想，冯玉祥一失败，他投奔到邹平“乡村建设研究院”；成立“乡农学校”时，他在邹县，所以我跟他在那里会过一面。也正是一九三六年“三大敌人”迂回大乱的时候，邵剑秋同志在四区的沙沟以东，周营这一块地方也建立起一支游击队，战斗力很强。这部分武装的建立，其初也是受“CC派”的领导，但也有邵剑秋同志的个人目的：“一、保全自己的财产；二、对付姓孙的”。尽管这样，由于邵剑秋同志本人是青年学生，有“抗战”热情，在我们“特种工作训练班”学习了一期之后，毫不犹豫地参加了革命，受“运河支队”的领导，当了支队副。

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国民党政客们，本想乘“邹坞暴动”之机，掀起一场镇压群众的风波，闹得一时之间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；詎料，倏而“甲光向日金鳞开”，阴谋未果。唯其他不甘于“风波”的源自平息，所以犹自“强聒不舍”，暗地里曲曲，如同已经走上“角力场”的斗士，“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”，在蓄好架式，准备随时同我们进行“攫、揪、扑、掀……”地决一雌雄。对方的阵容又是怎样的呢？彰明较著的自然是县南的“黄”，县北的“梁”，已经持有反共武装。这是明枪，自不待言，还有暗箭，尤须注意。说到尤须注意，要剖视一下二区。

二区是“崔、薛、田”三大封建势力盘据的地面，谁若想在这“三家者”的“二亩八分地”上伸伸腿，颇非易事。他们都是地方上强有力的统治者，都不是“瓢杆子”，但对我们直接构成威胁的，还是三大家的头一家——“齐村崔”。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，先说短一点的后两家。

西石沟的“薛”，他们姓里的几家地主的土地合起来，有四十多顷地，都阔得淌油。

南石沟的“田”，这大许是田洪年家的故事；一次，有二百多土匪去抢他，他把钱窑打开，让他们：“您随便拿吧！”一人一个“元宝”没拿了，下剩的铜钱谁还要。您看富不富！

“齐村崔”，当然一般是指崔翰林家。崔翰林家，我给他有亲戚，怎么亲戚呢？翰林崔广沅他叔兄弟的儿媳是我姐姐，翰林他孙子，人称“大烧包”，绰号“串官候”的崔绍颖，就叫我表叔，这不是亲戚了吗？亲戚是亲戚，在“革命”与反“革命”这岔道上各走各的，虽亲而不亲。提起崔绍颖的两个外号，不得不涉及他点“人品不足”的行为，如果你认为：“勿得为其‘反革命’而……”十分遗憾，那是你对我“实话实说”的最大误会。群众说崔绍颖是“大烧包”，是因为他的生活“奢侈糜费”得已经不堪入目；说他“串官候”，是因为他见了女的就“麻爪”了，只要她长得“标致”，别管是谁，即定是自己家里的兄弟媳妇、姐妹也免不了得“来一套”，远一点就不用再说了。真是“糜烂透顶”。假若战国时代的齐襄公……满清时代的军机大臣张之洞诸人还在，对崔绍颖也得“服伏在地”，别见笑，从古如斯，丑事出“大家”。